

《额尔古纳河右岸》英译本中文化负载词的变译研究

魏佳博

中国矿业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江苏 徐州

收稿日期：2026年7月17日；录用日期：2026年8月21日；发布日期：2026年9月2日

摘要

《额尔古纳河右岸》英译本由美国汉学家徐穆实翻译，蕴含大量承载鄂温克族独特文化的文化负载词。本研究以变译理论为视角，从增、减、编、述、缩、并、改七种变通手段出发，考察徐穆实英译本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行为。研究将文化负载词划分为生态、物质、社会、宗教和语言五类，对七种变译手段在各类文化负载词中的运用情况进行案例分析。研究发现，七种变译手段在译本中均有所运用，不同手段的选用与词汇的文化属性及语境功能密切相关，反映了译者在文化保留与读者理解之间的动态权衡。

关键词

变译理论，文化负载词，《额尔古纳河右岸》

A Study on Translation Variation of Culture-Loaded Words 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Last Quarter of the Moon*

Jiabo Wei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Xuzhou Jiangsu

Received: July 17, 2026; accepted: August 21, 2026; published: September 2, 2026

Abstract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Last Quarter of the Moon*, rendered by American sinologist Bruce Humes, contains a substantial number of culture-loaded words that carry the unique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Evenki peop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 Variation Theory, this study examines Humes' translation of culture-loaded words through seven techniques: amplification, deletion,

文章引用：魏佳博. 《额尔古纳河右岸》英译本中文化负载词的变译研究[J]. 现代语言学, 2026, 14(9): 18-25.

DOI: 10.12677/ml.2026.149893

edition, narration, contraction, combination, and adaptation. The culture-loaded words are classified into five categories—ecological, material, social, religious, and linguistic—and a case analysis is conducted to investigate how the seven techniques are applied to each category.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all seven techniques are employed in the translation, and the selection of specific technique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ultural attributes and contextual functions of the words, reflecting the translator's dynamic negotiation between preserving cultural distinctiveness and ensuring reader accessibility.

Keywords

Translation Variation Theory, Culture-Loaded Words, *The Last Quarter of the Mo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额尔古纳河右岸》的作者是当代著名女作家迟子建。这部小说是她的代表作之一，于2005年首次出版，并于2008年荣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小说以一位年届九旬的鄂温克族最后一位酋长女人的口吻，讲述了一个横跨近百年的宏大故事。它描绘了中国东北大兴安岭地区的一个以驯鹿、狩猎为生的少数民族——鄂温克族的生存、发展与变迁，以及他们在现代文明冲击下的挣扎与坚守。其英译本 *The Last Quarter of the Moon* 由美国翻译家徐穆实(Bruce Humes)执笔。徐穆实是一位长期致力于翻译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汉学家，尤其擅长处理具有复杂文化背景的文本。自其英译本出版以来，受到了国际文学界和评论界的广泛关注与高度评价。它吸引了那些对世界文学、土著文化、女性叙事、历史小说以及生态文学感兴趣的读者群体。它不仅使读者看到一个前所未闻的中国故事，也传递了原作的文学美感与文化精髓，在国际上有效地传播了中国少数民族的独特声音，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一个典型案例。

在翻译研究领域，如何有效传递文学作品中的文化特色，始终是学界关注的核心议题。文化负载词是民族文化的核心载体，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化传递的整体效果。廖七一指出，文化负载词是指标志某种文化中特有事物的词、词组和习语，这些词汇反映了特定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积累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的活动方式[1]。这导致了东西方传统文化出现本质的差别，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给翻译活动造成了难度。变译理论的核心关切与文化负载词的翻译难题高度契合。文化负载词承载着源语文化中独特的地理环境、生活方式、宗教信仰与价值观念等，在目标语中往往缺乏现成的对应表达，因此翻译过程必然涉及对原作信息的选择、调整与转化。这正是变译理论所关注的“变”的核心问题。变译的七种手段(增、减、编、述、缩、并、改)为分析译者在处理此类词汇时的具体操作提供了清晰、可操作的分析框架。

基于此，本研究以变译理论为视角，以徐穆实《额尔古纳河右岸》英译本为研究对象，将文本中的文化负载词分为生态、物质、社会、宗教、语言五类，从增、减、编、述、缩、并、改七个维度考察译者在处理各类文化负载词时所采取的变通策略，以期同类文本的文化翻译提供可资借鉴的思路与参照。

2. 变译理论概述

20世纪末我国学者黄忠廉提出了变译论，将其定义为“变译是译者据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的特殊需

求采用增、减、编、述、缩、并、改等变通手段摄取原作有关内容的翻译活动”[2]。变译与全译的最大差别就在一个“变”字，由变译的实质可以看出，“变”具体体现为增、减、编、述、缩、并、改七个方面[3]。

增，即补充必要信息，涵盖阐释、评论和添写三种情形。当原文表达过于隐晦或文化信息在译入语中缺失时，译者通过适当增补，使译文读者获得与中文读者相似的阅读感受。增译不仅服务于信息的完善，也体现为对原作文化内涵的深度挖掘。减，即删去对目标语读者而言冗余的信息。译者凭借敏锐的判断力，去除重复描写与文化枝节，使译文简洁有力，以有限的篇幅承载最有价值的内容，提升叙事节奏与阅读体验。编，即对原作内容进行条理化处理，包括编选、编排与编写。编译将原文信息加以系统重组，通过调整语序和表达方式，使译文更加贴近目标语的认知模式。述，即基于原意进行转述或复述，不拘泥于原文形式，重在传达深层含义。述译要求译者在理解原意后用自己的话重新呈现，适当省略部分细节，使信息传递更为直接高效。缩，即压缩原作内容，提炼核心信息。缩译考验译者的概括能力，要求对长句和复杂结构进行精炼处理，以简驭繁。并，即将具有逻辑关联的多个部分加以合并。并译通过对同类信息的集约化处理，增强译作的紧凑性与逻辑性，提升阅读效率。改，即对原作进行实质性调整，涉及内容、形式乃至风格的转换。改译本质上是一种基于原文的再创作，针对不可译成分或文化特定表达，采用目标语中功能相近的表述加以替换，既保留源语文化特征，又兼顾译文的可理解性。上述手段在翻译实践中常交叉使用，彼此配合，共同推动跨文化传播的有效实现。

变译理论主张，译者在忠实原作的同时，也应立足文化传播的高度，以目标读者的信息需求为导向，对原作进行有策略的调整与转化，从而实现信息传递的有效性。变译过程本质上是一种策略性选择，是译者在原作忠实性与读者可接受性之间寻求平衡的动态协商。在这一过程中，译者以整体优化为导向，依据读者群体的阅读期待，从内容和形式两个维度对原作进行加工处理，力求使译文在目标语境中发挥最佳效用。优化的必要性源于原作内在结构与功能特征的多样性，以及译语读者需求之间客观存在的不对称关系。为此，译者需要充分发挥主体意识和能动性，精准定位目标读者群体，审慎选择变通手段，恰当运用各类变译方法，最终实现原作使用价值的最大化呈现。

3. 《额尔古纳河右岸》英译本研究现状

关于《额尔古纳河右岸》英译的相关研究，根据现有文献的主要取向，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民族类题材文本的传播研究，二是不同理论视角下的英译策略研究。

第一类民族类题材文本的传播研究中，部分学者关注《额尔古纳河右岸》作为民族类题材文本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效果。宋宝平分析了迟子建小说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接受历程，指出其从早期“译多介少、视角单一”的困境，转向因鄂温克异域文化元素受到关注的过程[4]。陈俐澜从译介的主体、内容、途径、受众和效果五个方面分析其译介过程，探讨了民族类小说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方式[5]。此外，不少学者采用汉英平行语料库作为辅助工具，以增强分析的客观性与精确性。其中，汪晓莉与胡开宝从民族意识形态的角度对英译本进行探讨，从四个方面分析了译者徐穆实民族意识形态的具体体现，并指出译者的民族意识形态是影响译本能否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6]。此类研究为本课题提供了传播学与语料库方法的重要参考。

第二类不同理论视角下的英译策略研究中，学者从多元理论视角出发，探讨《额尔古纳河右岸》英译本中的翻译策略与效果。在译者主体性层面，胡仙兰与岑群霞探讨了影响译者主体性发挥与制约的因素，指出译者主体性是民族文化英译传播中的积极要素[7]。在陌生化现象层面，付琳纳对英译本中的陌生化处理进行了探析，讨论了英译本对陌生化成分的翻译策略[8]。

综合上述文献可见，学界已从多个视角对《额尔古纳河右岸》英译本展开了较为丰富的研究。然而，

迄今为止，尚未有研究从变译理论的角度对该译本中的文化负载词英译情况进行系统考察，因此，有必要在这一领域开展更为细致的理论与研究。本研究拟以变译理论为指导，聚焦《额尔古纳河右岸》中文化负载词的英译展开分析，以期弥补上述研究空白。

4. 文化负载词英译的研究现状

关于文化负载词的相关研究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文化负载词的本体研究，二是特定理论视角下的文化负载词翻译研究，三是具体文本中的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研究。

在文化负载词的本体研究方面，麻珍玉指出，文化负载词是对外汉语翻译中的重要词类，其主旨在于加强读者的文化理解。由于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存在差异，读者在阅读他国著作时往往面临障碍，文化负载词的出现正是为了帮助翻译者更好地认识并传递文化信息，从而实现与英语国家等目标语文化的深层次交流[9]。上述研究为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实践奠定了功能认知与原则导向。

在特定理论视角下的文化负载词翻译研究方面，学者们引入了多元理论框架以增强解释力。在认知语言学路径上，李孝英等人以具体术语为切入点，挖掘其认知方式与文化内涵，提出了科学化的英译建议[10]。景芳从语域理论的视角出发，围绕语场、语旨和语式三要素，分析文化负载词在翻译转换过程中的对等问题，以期正确传达文化信息，尽可能实现翻译对等[11]。

在具体文本中的文化负载词翻译策略研究方面，学者们以不同典籍或文学作品为对象，归纳了文化负载词的具体翻译方法。如张璇通过《黄帝内经》两个英译本的对比实证研究，探讨了文化负载词的分类与相应翻译策略[12]。上述研究表明，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选择往往受到文本类型、文化距离与传播目的的共同制约。

5. 数据收集与分类

5.1. 数据收集

本研究通过对《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平行文本进行分析，根据奈达对文化负载词的五种分类方法：生态文化负载词、物质文化负载词、社会文化负载词、宗教文化负载词以及语言文化负载词[13]，对文本中的文化负载词进行识别和分类标注，以期明晰文本中存在哪些文化负载词。标注完毕后统计所得数据，量化每类文化负载词的数量及频率。

5.2. 数据分类

根据奈达的文化负载词分类体系，本研究共识别出 648 个文化负载词实例，共在文中出现 1443 次，并将其归纳为五大主要类型：生态文化负载词、物质文化负载词、社会文化负载词、宗教文化负载词以及语言文化负载词。各类型的分布情况如表 1 所示：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culture-loaded words in *The Last Quarter of the Moon*
表 1. 《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文化负载词分布

	频率	数量
生态文化负载词	147	380
物质文化负载词	122	386
社会文化负载词	76	205
语言文化负载词	226	281
宗教文化负载词	77	191

由表 1 可知, 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五类文化负载词当中, 生态文化负载词和物质文化负载词的数量较多, 分别为 380 和 386 处, 约各占总数量的 26%。但语言文化负载词的频率最高, 有 226 项, 约占总文化负载词个数的 34%。鄂温克族是一个森林狩猎民族, 其文化与生存方式与大自然紧密相连。因此, 描述山川、河流、植被、动物以及与之相关的桦皮船、希楞柱、靠老宝的词汇, 构成了他们日常生活的物质基础与认知框架。生态以及物质文化负载词是这个文化体系的“硬件”和“场景”, 可能是这两类负载词出现数量多的原因。社会文化负载词和宗教文化负载词频率出现相对较低。社会文化负载词涉及制度规范与传统习俗等领域, 出现 76 项, 约占总文化负载词个数的 11%。宗教文化负载词则包含信仰体系、神话传说等内容, 共有 77 项, 约占 11%。虽在出现频率上较低, 但也承载了鄂温克族人们的道德价值和宗教情感等, 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不同类别的文化负载词在文化属性、语义结构和文本功能上存在差异, 译者在处理时可能采取不同的策略取向, 甚至在同一类别内部, 亦可能因具体语境而灵活调整。下文将结合译例, 分别辨析五类文化负载词在英译过程中译者所采用的变译手段。

6. 《额尔古纳河右岸》英译本中文化负载词的变译

上述七种变译手段从信息补充、删减、重组、转述、压缩、合并到意象替换, 涵盖了一部作品在跨语言转换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类文化障碍与文本处理需求。在《额尔古纳河右岸》这类文化负载密集的文本中, 译者面对的具体情境——是保留异质文化意象、删减认知冗余, 还是重构叙事逻辑——均可在七种手段中找到对应分析路径。因此, 以下将依据七种手段的分类, 对译本中五类文化负载词的翻译进行案例分析。

6.1. 生态文化负载词

例 1: 我对桦皮船的记忆, 是跟堪达罕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习惯叫它“扎黑”。堪达罕是森林中最大的动物了, 它有牛那般大, 成年的堪达罕有四五百斤重呢!

译文: My memories of birch-bark jawi are as-sociated with the elk, the largest creature in the forest. A mature kandahang can weigh two hundred and fifty kilos!

本例中, 译者采用了变译理论中的减译手段。原文中“堪达罕”与“扎黑”指向同一事物, 是鄂温克语中同一动物的两种称谓。译者经过判断, 删去了“扎黑”这一别称信息, 仅保留“kandahang”作为唯一指称, 避免同一事物的多种称呼给读者造成理解上的障碍。这一减译处理在完整保留核心信息的前提下, 有效降低了目标语读者的认知负担, 使叙述更加流畅清晰, 体现了译者对读者接受能力的主动关照。

例 2: 黑熊蹲仓的时候, 通常选用两种方式: 开“天仓”或者是“地仓”。它们选择一棵中空的树筒作为它们的“仓”, 也就是藏身之地。

译文: Hibernating black bears choose a tree hollow as their hiding place.

原文用较长篇幅分述两种冬眠方式及其术语, 译文将其凝练为一个概括性陈述。原文中“仓”“蹲仓”“天仓”“地仓”“树筒”等鄂温克族狩猎文化术语承载着丰富的民族生态知识, 是特定文化语境下的地方性表达, 译文将其减译、缩译为“a tree hollow”这一个核心词。这一过程涉及对内容体量的压缩, 为减译和缩译相结合的手段。

6.2. 物质文化负载词

例 3: 达玛拉挑针走线地足足做了半个月, 她在手套的腕口处绣了三圈花纹, 一圈是火纹, 一圈是水纹, 一圈是

云纹。

译文: She spent half a month executing the needlework, embroidering three circles at the wrist: one contained fire, one water, and one clouds.

原文以排比句式呈现“一圈是火纹，一圈是水纹，一圈是云纹”三个独立分句，结构重复、信息密集。译者在译文中将三者合并为“one contained fire, one water, and one clouds”的并列结构，共用谓语动词“contained”，实现了三个独立成分的集约化处理。并译的运用使译文在完整保留原文信息的前提下，避免了重复表达，结构更为紧凑，节奏更为流畅，有效降低了目标读者的阅读负担。

例 4: 我去接他时，他像一块石头一样蹲伏在河畔，手里握着他父亲遗留下来的口弦琴——木库莲，一动不动地望着我。

译文: When I went to fetch him, he was crouched like a stone by the riverside. In his hand he held the mukulén – a mouth harp left by his father. He simply watched me, motionless.

本例中，译者对“木库莲”这一鄂温克族特有乐器名称采用了增译策略，具体表现为阐释性补充。原文以“口弦琴——木库莲”的并列结构同时呈现了器物的通用类别与民族语名称，中文读者可借助“口弦琴”获得对器物的基本认知。然而，若在译文中仅保留音译“mukulén”，英语读者将面临完全陌生的词汇而无法建立任何意义关联。译者在“mukulén”后以同位语形式补充了“a mouth harp”，既保留了鄂温克语的原音与民族特征，又通过功能性描述为读者提供了可理解的信息入口。增译手段的使用，使译文在文化保留与信息可及性之间达成了有效平衡。

6.3. 社会文化负载词

例 5: 在瘟疫发生的那段时光，我们没有搬迁。狩猎活动也终止了。

译文: During the reindeer epidemic we didn't move camp or hunt.

原文以两个独立分句分别陈述“没有搬迁”和“狩猎终止”两种行为，彼此之间缺乏显性的逻辑关联。译者运用了变译理论中的编译手段，在译文中将二者整合为“didn't move camp or hunt”的并列结构，统一置于“during the reindeer epidemic”的时间状语之下，使信息呈现更加集约，逻辑关系更加清晰。这一编排不仅简化了译文句式，也实现了对原文内容的系统性重组，体现了编译在信息优化方面的功能优势。

例 6: 所以他一咽气，鲁尼就差人去他们氏族报丧，他们来的时候，将接灵的马车也带来了。

译文: So when Kunde breathed his last, Luni dispatched a messenger to inform Kunde's clan of his death, and when they came, they brought a horse-drawn carriage to take his body to his clan's cemetery.

本例中，译者对“报丧”与“接灵”两个丧葬文化术语采取了改译为主的翻译策略。原文中的“报丧”与“接灵”是中国传统丧葬仪式中的固定称谓，承载着特定的文化仪式感。译者在译文中将其分别转述为“inform Kunde's clan of his death”和“take his body to his clan's cemetery”，用目标语读者熟悉的叙述语言替换了源语的文化特定表达，使叙事信息清晰可读。同时，译文补充了原文未明确交代的“to his clan's cemetery”，为“接灵”行为提供了完整的叙事归宿，有效消除了目标语读者的理解空白。改译与增译的协同运用，使译文在牺牲部分文化特异性的同时，换取了更广泛的读者可及性与叙事流畅度。

6.4. 语言文化负载词

例 7: 瓦罗加说，也许我们看到的只是王录和路德表面的东西，他们还日本人做了什么事，捞取了什么好处，

或许我们是蒙在鼓里的。

译文: Perhaps we only saw superficial things about Wang Lu and Ludek, cautioned Valodya. 'Maybe we were kept in the dark about what else they did for the Japanese, and what they got in return.'

本例中,译者对成语“蒙在鼓里”采用了述译手段。原文“蒙在鼓里”以“被封闭在鼓内”的意象比喻“被屏蔽信息而不知情”。译者在准确理解这一成语的深层含义后,并未拘泥于“鼓”这一具体文化意象,而是将其转述为英语读者更为熟悉的自然表达“kept in the dark”,以“处于黑暗中”对应“信息被屏蔽”的语义功能。述译手段的运用,使译文在保留原文语义的前提下呈现出高度的自然性与流畅度。

例 8: 但他们为什么要抛弃亲生骨肉呢?

译文: But why would they abandon their own flesh and blood? wondered the innkeeper's wife.

成语“亲生骨肉”是中国文化中对血缘关系的形象化表达,译者采用了改译手段,在译文中将其处理为“flesh and blood”,后者是英语中的固定习语,同样以“人体构成”比喻“血缘亲属”,在语义、情感色彩和文化功能上均与“亲生骨肉”形成对等。这一改译处理使译文在保留情感力度的同时,成功跨越了语言表达的障碍,避免了直译造成的意象无效或语义中断。

6.5. 宗教文化负载词

例 9: 据说只有我出生的那天,尼都萨满因为前一夜梦见了一只白色的小鹿来到我们的营地,对我的降生就表现出无比的欣喜,喝了很多酒,还跳了舞,跳到篝火中去了。

译文: It is said that the night before I was born, Nidu the Shaman dreamed that a white fawn would arrive in our camp. This was auspicious, so he showed unmatched joy at my birth, drank more than his share of liquor and that was what made him dance right into the bonfire.

本例运用了增译手段,具体体现为阐释性补充。原文中“尼都萨满因梦见白鹿而对‘我’的降生表示欣喜”这一情节隐含着一个文化前提。在鄂温克族萨满信仰体系中,白鹿是吉祥的象征,其出现在梦境中预示着好运。然而,这一文化逻辑对不熟悉鄂温克族传统信仰的英语读者而言并不透明。译者在译文中主动补充了“This was auspicious”一句,将梦境与欣喜之间的因果关系直接点明,使原本含蓄的文化逻辑得以显性化。这一增译处理使译文在保留原作叙事风貌的同时,为目标语读者扫清了文化理解的障碍,有效实现了文化信息的跨语言传递。

例 10: 尼都萨满说,这次去不是给人跳神,而是为生病的驯鹿跳神,没什么好看的,他让我留在营地帮助母亲晒肉干。

译文: “That time I'm not going to do a Spirit Dance for a person, it's for some sick reindeer,” he said. “Nothing worth watching. You stay here and help your mother make jerky.”

本例中,译者对萨满话语的翻译采用了述译手段。萨满在鄂温克族中指人与神灵之间的中介者。译文中,译者完全放弃了间接引语的框架,将萨满的整段话重构为直接引语。将原文中“他让我留在营地帮助母亲晒肉干”这一叙述性长句改造为直接引语“You stay here and help your mother make jerky”,这不是逐字转换,而是提取核心意义后重新表达。这一重述使萨满以第一人称“我”的身份直接对读者说话,改变了原文的叙事声音与读者距离感。

7. 结语

本研究以变译理论为分析框架,从增、减、编、述、缩、并、改七种变通手段出发,系统考察了徐穆

实《额尔古纳河右岸》英译本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行为。通过语料标注、数据统计与案例分析的结合，本研究揭示了译者在处理五类文化负载词时所呈现的策略选择特征。

译者在保留原作民族特征的同时，有效弥合了中西文化认知的鸿沟。增译使隐含的文化逻辑与感官体验得以显性化，减译剥离了可能造成认知冗余的地方性细节，编译重构了叙事信息的内在因果链条，述译以目标语读者的叙事习惯重新讲述文化场景，缩译将复杂的文化概念凝练为可理解的核心表达，并译实现了排比铺陈的集约化处理，改译则将不可译的文化意象转换为功能对等的目标语表达。七种手段的协同运用，使译本在可接受性与文化传播性之间实现了动态平衡。

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要求翻译实践超越传统的“忠实”和“背叛”的二元评判，转向更具弹性的策略性变通。对于《额尔古纳河右岸》这类承载厚重文化内涵、跨文化感知差异显著的文本而言，译者宜在核心文学特质上坚持异化取向，以保留原作的民族精神底色；在具体文化细节上灵活归化，以降低目标读者的理解门槛；在叙事组织上主动编译，以优化信息传递的逻辑链条。三者协同，可更好地实现兼顾原作精神与读者体验的平衡。

在理论层面，本研究首次将变译理论系统运用于《额尔古纳河右岸》英译本的分析，验证了七种变通手段在民族文学英译中的解释力，拓展了变译理论的适用边界。在实践层面，本研究所揭示的“文化属性—变译手段”对应关系，可为同类文本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选择提供参照。在方法层面，本研究采用的五类划分与七种手段交叉分析的模式，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了可操作的路径。徐穆实的翻译实践表明，发挥译者主体性，通过表达形式的改变来实现文化信息的有效传译，是民族文学外译的有效路径。本研究揭示了变译理论在文学翻译中具有实践价值，对翻译策略选择具有指导意义，期待能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走出去提供参考意义。

参考文献

- [1] 廖七一.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0.
- [2] 黄忠廉. 变译(翻译变体)论[J]. 外语学刊, 1999(3): 80-83.
- [3] 黄忠廉. 变译的七种变通手段[J]. 外语学刊, 2002(1): 93-96.
- [4] 宋宝平. 文本译介与文学对话——从《额尔古纳河右岸》英译看中国当代文学跨文化传播[J]. 小说评论, 2024(5): 86-93.
- [5] 陈俐澜. 少数民族题材小说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以《额尔古纳河右岸》为例[J]. 兰州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39(2): 38-42.
- [6] 汪晓莉, 胡开宝. 民族意识形态与少数民族题材小说翻译——以《额尔古纳河右岸》英译为例[J]. 中国外语, 2015, 12(6): 90-98.
- [7] 胡仙兰, 岑群霞. 译者主体性视角下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民族文化英译探析[J]. 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 2017(5): 138-142.
- [8] 付琳纳. 当代民族文学的陌生化表达及其英译再现阐释——以《额尔古纳河右岸》徐穆实英译本为例[J]. 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20(2): 56-64.
- [9] 麻珍玉. 汉语文化负载词的对外翻译研究[J]. 语文学刊, 2015(30): 63-64.
- [10] 李孝英, 赵彦春, 郭虹园. 中医药文化负载词内涵挖掘及英译认知研究——以“阴”“阳”为例[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23(2): 90-96.
- [11] 景芳, 段成. 从语域理论视角浅谈文化负载词的翻译[J]. 中华文化论坛, 2017, 3(3): 110-116.
- [12] 张璇, 施蕴中. 《黄帝内经》常用文化负载词英译[J].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2008, 28(10): 941-944.
- [13] Nida, E.A. (1964)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